

庆 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四十周年



戴克瑜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联合编辑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戴克瑜选集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合编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一九八八年

戴克瑜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主编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出版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发行组发行
(成都市总府街六号)

成都市自力印刷厂印刷 1988年

字数 100千字 印数1—1000册

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88048

3.00元

简 历



戴克瑜，四川省江北县人，一九三六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六〇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攻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成都拖拉机总厂总工程师办公室情报室从事图书情报工作。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新调四川省图书馆工作。一九八三年首批晋升为情报工程师。

在学会工作方面，现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基础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理事，《四川省图书馆学报》编委，四川省科学技术情报理事，成都市科学技术情报学会常务理事。

序

我自一九六〇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工作以后，才与图书、情报这个行道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我真正潜心研究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有关理论和实际问题，还是从一九六四年才开始的，这大概是与自己本职工作有关吧。

一九六三年夏天，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举办“图书馆干部进修班”，这对我一个非图书馆科班出身的图书馆工作者来说，的确是一次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在学习期间，有幸结识了许多图书馆的老前辈，如张德芳、丁道谦、吴声亮、林铭钧等老师。也正是在他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使我对图书馆的工作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对图书馆学这门学问，特别是对中文工具书的检索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决心下一些功夫探索其中奥秘。

进修班结束后，我和同班的邵森万、夏发奎、唐建华等同志被留下来继续研究工具书的诸多问题。不久，我们集体编写出了《工具书原理略》、《工具书类型试述》、《工具书特点探讨》及《类书的沿革》等四本油印小册子。书出后，在当时的图书馆界产生了一些反响。刘国钧老先生曾亲临成都给予鼓励和指教。那时，我们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工具书学应当独立成一门专门的学科。当然，这个观点是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更有待实践来检验了。不过，从二十多年来图书馆界关于工具书的研究情况看，是大大发展了，专著、论文如雨后春笋，形势十分喜人。我相信，工具书学这门学科一定会逐步建立起来。在这门学科的指导下，将会有更多更好的工具书问世。

因此，我在这本论文选中，侧重收集了一些有关工具书研究方面的文章，以求教于同行学者。同时，也收入了几篇有关情报

方面的文章，以求教于同行学者。此外，也收入了几篇有关企业情报方面的文字，期望能同企业情报人员进行交流。

最后，我深深感谢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四川省图书馆学会、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为我的论文选集编辑、出版所付出的辛劳。

戴克瑜

一九八八年十月于成都

目 录

简历.....	(1)
序.....	(1)
論工具书学.....	(1)
什么是工具书.....	(29)
工具书的类型及其划分标准.....	(30)
部首检字法简介.....	(33)
世界百科全书发展历史概述.....	(39)
字典、辞典論略.....	(57)
类书引論.....	(68)
类书“功”“过”随谈.....	(78)
大力开展学术研究活动.....	(85)
图书馆与智力資源开发.....	(88)
市场情报调研与产品开发.....	(96)
新的技术革命与企业情报工作改革初探.....	(100)
著作目录.....	(107)

论 工 具 书 学

一、工具书学的概念

工具书学是从总体上研究各种类型工具书产生、发展、编辑、收集、管理和使用的共同规律和使用方法的科学。

工具书学之所以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它独特的研究对象的，任何人也不可能凭空杜撰得出来。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一事物都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当然，工具书学也不例外。为了正确揭示和科学地阐明工具书学的历史，“最可靠、最必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就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列宁：《论国家》，载《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0—431页）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工具书学这一概念的产生，正是对工具书这一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概括，是从具体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工具书中抽象出来的。所以，为要探索工具书学的历史渊源，又不能不从一本一本具体的工具书谈起。

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都是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的。当然，归根到底决定其发展的还是人们的生产斗争实践。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从开始起便是由生产所决定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9页）而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工具书学，自然也不会从天而降，它是在数千年来工具书的发展历史过程中

逐渐形成起来的。尽管它在一开始的时候，还只是一些未成体系的东西，但是它对于后来的发展却产生着直接的深远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从最早一本工具书的出现开始，就已经孕育着了工具书学的最初萌芽。因为如前所述，任何一部工具书的产生都是由于时代和人们的客观需要，以及工具书自身矛盾发展的结果。作为一部工具书来说，无论在所收资料的内容上，或者在其结构形式上，都是有特殊要求的，也只有当人们充分认识和掌握了工具书的本质属性和客观规律以后，才能编辑出一本真正的工具书出来。拿我国最古的一本工具书《尔雅》来说，姑且不论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科学价值，单就它对所辑录来自古代大量的词语，以及对这些资料的归类来说，的确首创了工具书分类编排法的范例，故有人认为，《尔雅》是一部分类的百科性辞典。当然，这并不排斥该书在分类上还有一些不够妥当的地方。同时，还应当承认，《尔雅》的作者编著此书的直接目的还是在于解释六经训诂，只是在客观上起着工具书的作用。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而效果又常常是检验动机的一个标尺。由此可见，《尔雅》的作者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对工具书的内在矛盾以及客观规律性作了探讨，而这种局部性的探讨都是构成整个工具书学研究的一个因素。

又如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字（包括字形、字音和字义三个方面）的研究，发现并第一个使用了部首排列方法。这种排列方法又主要是以汉字的形体为根据的，如以“一”为部首，凡从“一”得义的字，象五、元、天、丕、吏、王、可等字，均收入“一”部。又如以“人”部开始，以下排列也都由“人”字“据形系联”。这种排列方法，为的是便于寻检和记忆，它完全体现了工具书的本质特点，即便于人们迅速、准确地查到自己要查找的东西。后来许多工具书在排列形式上都采用此法，并且还有所发展和创造。到现在为止，我国历史上所创

造的汉字检索方法就达数百种之多。这就说明了过去曾经有不少的工具书编辑家，对工具书学各方面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尽管他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的方面有所不同，也许有些研究还不是很自觉的，但是千条小河归大海，正是这些点滴的和各种不同方面的研究，为工具书学这门学科体系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并逐渐积累起了经验，丰富了工具书学的内容。解放前，我国图书馆界也有不少专家和学者，对工具书的历史发展、类型等理论问题进行过一定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例如张涤华的《类书流别》（1943年），汪辟疆的《工具书的类型及解题》（1934年），何多源的《中文参考书指南》（1938年），以及邓衍林的《中文参考书举要》（1936年）等等。解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迫切要求有更多的不同类型的工具书出版，并积极为之服务。就在这个不太长的时期中，出现了不少学术价值极高的工具书，如象《中国丛书综录》、《辞海》、《辞源》（修订版），以及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等。而且探讨各种工具书的沿革、编辑、收集、管理、使用规律的文章，更是到处可见。

在实践上，全国各系统图书馆对工具书的收藏和提供利用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尽管大家认识还不太统一，但基本上是按照工具书学的规律来进行的。有些领域已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了，如“辞典学”即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了，既然以字典、词典的编辑为研究对象都可以自成为一门学问，那么以各类工具书作为研究对象的工具书学为何反到不成其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呢？

所有这些情况都充分证明，工具书学这门学科是客观存在的，它有自身的发展历史，以及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只不过还没有形成一整套严密的科学体系而已。当然，要确切说出工具书学是何年何月何日诞生的，那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

情，因为任何一种新兴学科的产生到形成，都必然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如此。但一般说，所谓“诞生”，就好象一个刚出世的小孩一样，一开始各方面都还没有成型，后来才逐渐走向成熟。那就是说，只要当人们已经发现了这是一门专门的学科，指出了有对各种不同类型工具书进行总体研究的必要，并开始揭示出它特有的研究对象的时候，就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完整的理论体系，那还是今后的事情。不过，我们坚信，工具书这门新兴的学科一定能够在中国建立起来。

另外，还有必要指出，过去为什么没有提出“工具书学”这个问题呢，那是有许多方面原因的，为了促进工具书学的建立、形成和发展，的确有深入分析和揭示这种根源的必要。

（一）历史上的原因

古往今来，人们都只把工具书当着一种治学的工具，但并不把它看成为一门学科。即或如此，古人对于象类书之类的工具书也并不是很重视的。在他们看来，做学问就得靠硬功夫，强调对古典经籍的死背硬记，所以他们往往讥笑类书为“兔园册子”，“高头短书”“粪土糟粕”。说什么类书是“剽窃裨贩，颇荒学术”；“自作聪明，牵强附会，难于凭借”；“贻误后代”，等等。总之，把类书骂得狗血淋头，比什么都坏。据说清朝有个叫吴志伊的，在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因为他对类书很熟悉，阎百诗还笑他为“类书之学”。后来又有曾广钧因熟览《渊鉴类函》，王王秋听后都为之惊倒，以至后来许多迂腐儒师也禁止人们去读类书之类的工具书。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广大的读者需工具书，从事研究工作和致力学术的人亦需要工具书，特别是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需要有大量高水平、高质量的工具书为它服务，而且已经出版了不少优秀的工具书。但是，由于传统历史偏见的长期影响，一般人虽然也承认

工具书有用，但并未把它提到一门学科的高度来看待。既然如此，当然也就犯不着对它进行专门的研究了。

（二）社会制度的原因

任何一种新的学科都是适应生产斗争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促成某种学科的形成上，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时期，由于胡适的反动实用主义的泛滥，曾经影响了许多科学的研究。他们只从眼前的微小利益出发，强调一个一个个问题的“解决”，当然也就不会来对各类工具书进行总体性的理论研究，以形成这门学科的完整体系，因为这样做对他是既无益又没有必要的。尽管如此，当时图书馆界的专家和学者也曾对工具书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的研讨，发表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根据我们的分析，他们已经感觉到有对工具书历史沿革进行彻底整理和研究的必要，以便为工具书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打开航道。正如《类书流别》的作者张涤华先生在重版自序中所说：“这本书是二十多年前我试写的一本专著。当时我正在武汉大学读书，对目录学很感兴趣，经常翻阅这方面的书。看了一些之后，我拟了一个写作计划，想把字书、韵书、类书、丛书等等工具书统统作一次结帐式的整理，并且打算每一种都写长篇。这个计划很大，而我能够抽出的课余时间却并不多，所以后来只写了这本《类书流别》，我的编写工作就因毕业离校而戛然终止了。”（张涤华：《类书流别》，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版，第4页）。但由于时代和社会制度的限制都未能实现其宏愿。

新中国诞生以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工具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各种不同类型的工具书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出来，有关工具书学理论的研究文章和专题论著，更是比比皆是。这一切

都令人信服地表明，我们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工具书学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条件。

（三）认识上的原因

以往人们常把工具书与一般参考书等同相待，这就混淆了他们之间的本质属性。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汪辟疆先生，他是我国第一个为工具书定名的人，他的早期著作的书名（《工具书的类型及解题》）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事实上，工具书和一般参考书是有着严格界限的。顾名思义，工具书者，乃检索资料，兼辅阅读的工具也。一般地说，工具书属于第二手资料，它的最主要功能是专供人们翻检查考知识和资料，在特定情况下，适当辅以阅读。而参考书则是第一手资料，它是使用者直接系统阅读的对象，读者通过它可以获得某一学科或某一范围内的系统知识。同时，在编排形式上二者也是极不相同的，一般性参考书并不具备完整的检索系统。正是由于人们的认识各异，把工具书与参考书等量齐观，不加区别，当然工具书学也就没有理由“独立”了。如果硬要把它当成一门学科来研究，岂不成了画蛇添足之举！同时还应当看到，正是由于这种观点，给我们图书馆的实际工作者在工具书的收集、分编、管理和使用上造成了许多困难。对于哪些是工具书，哪些不是工具书分辨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有的人甚至主张“工具书是因人而定的”。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因为工具书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它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每一个人都来个“因人而定”，那么工具书的范围就会无限扩大，工具书的本质属性也就不存在了。

在对工具书学的概念的认识上，也还存在某些差异。例如有的人说，工具书学是一门研究工具书的收集、管理和使用的学问，至于各类工具书的发展历史和它的编辑等理论问题，则应当

由“辞典学”之类的学科去解决。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不全面的，他分割了工具书学的完整体系和内容。应当说，工具书学应当对这两方面的内容都要加以研究，它的理论研究部分，包括研究各类型工具书的发展规律、揭示工具书的本质属性、工具书类型的划分，以及工具书结构形式的演变等；工具书的收集、管理和使用，则是工具书学的应用研究部分。只有把这两方面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工具书学的完整理论体系。

二 工具书学研究的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例如：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历史学是阐明史料的研究和利用方法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的发展的科学等等。

但是，要确定某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首先必须在理论上深刻阐明这一知识领域所固有的特殊的矛盾性，然后具体规定这一门科学应该研究哪些实际现象，以及这些对象的特定方面。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61年版，第297页）。

那么，什么是工具书学领域中的特殊矛盾呢？我认为，那就是全人类所创造的知识的无限性与人们占有这些知识的有限性之

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还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各种书刊文献的与日俱增而越来越扩大。我们知道，在遥远的古代社会，当时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水平都很低下，因而反映这种状况的书籍也并不太多，学科领域也不很宽广，人们通过毕生的努力来掌握整个社会的精神财富，也并非绝对没有可能。但是，随着人类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是异常丰富的，反映这种实践发展的书刊和其它文献资料，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浩如烟海。在这种所谓“知识爆炸”的情况下，如果光靠个人的努力来掌握这些巨量的知识财富，已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了。例如以美国《化学文摘》的出版情况来看，1957年只有101027条，1967年增加到240000条，到1977年便猛增到469883条，差不多每十年翻一番。若某人每周看40小时文献，一年文献就需要五十多年时间才能看完。同时，这只是就化学这一个学科领域而言的，事实上，一个化学家绝不只是限于阅读自己专业范围内的文献，他还必须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阅读和研究他们的著作，而且还要了解邻近和相关科学的知识。但是，由于一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语言文字水平等的限制，要读完这许许多多的著作和文字资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办到的。

这样，在客观上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表现得更加尖锐了。过去，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发展，导至了各种不同类型工具书的产生，工具书作为一种治学和指导读书门径的工具，要求它能研究和统一“博”和“略”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它要为人们提供极其广博的知识和资料线索，使人们借助这一工具能总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概貌；另一方面，它又要“略”，不能象一般书刊那样，对某个问题或某件事物进行全面、详尽和深入的论述，否则它就不能为人们节省时间，不能起到钥匙或桥梁的作用。从这里，我们又可以清楚地看

到：工具书学领域中的这个特殊矛盾，在目前除通过电子计算机检索和各种数据库检索解决部分问题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还得靠各种不同类型书本式工具书来解决。只要人们能够善于利用工具书这把打开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就能够迅速获得古代和现在世界上最新的而又是自己迫切需要的书刊文献和其它资料，从而大大缩短人们了解和掌握各方面知识的距离，节约出大量宝贵的时间，把绝大部分精力都用于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上。而各种不同类型工具书的编辑、收集、管理和使用等一系列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则必须要在工具书学这门专门学科的指导之下才能得到正确而完善的解决。

工具书学特殊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工具书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各种类型工具书的发展历史、编撰规律，以及收集、管理、使用的方法。具体点说，它必须要对以下一些实际现象进行研究，并作出必要的理论结论：

- (1) 工具书的产生、发展、演变历史及其规律；
- (2) 工具书的本质属性及基本特征；
- (3) 工具书的内容及其来源范围；
- (4) 工具书的结构形式及其排检方法；
- (5) 工具书的类型及其划分标准；
- (6) 工具书的收集、管理和使用；
- (7) 工具书的编纂原理和方法。

工具书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就必须对以上诸多方面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研究，而这些问题又是互相依附、彼此联系的。我们只有对各种类型工具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作了总结式的深入研究，才能正确认识工具书的本质属性及不同工具书的不同功能，揭示出工具书在编纂、收藏和使用方面的共同规律，从而使我们能自觉地根据工具书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和社会的特殊要求，改造和编纂出更多更好的工具书来。

我们从工具书学所特有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来看，它和书史学、目录学以及图书馆学等研究的对象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它们之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不能一概而论。

它们之间的共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无论工具书学也好，或是书史学、目录学以及图书馆学也好，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上产生的。

②工具书学、书史学、目录学以及图书馆学，是“图书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就向人种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一样，它们都是一门独立的专门的学科。

③工具书学、书史学、目录学以及图书馆学，一般都以“书”为研究中心。当然，这样说，并不排斥“人”的因素。

④在工具书学、书史学、目录学以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中，有某些互相交错和彼此补充的情况。例如书目，不仅书目学要研究它，工具书学也要研究它，只不过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上各不相同罢了。同时，从历史上看，现在作为工具书的一种类型的书目，早先还是从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尽管它们和古代的目录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们之间这种渊源关系。

另一方面，工具书学、书史学、目录学以及图书馆学在其形成的历史上，在它们各自研究的对象和具体内容上，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从它们产生的历史来看，我国最古老的书籍是刻在龟甲、兽骨（甲骨文）、铜器（铭文）、石头（石鼓文）或木竹片上的，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早在我国殷商时代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古老的甲骨文记录，这种书籍所用的材料并不很固定，有用甲骨、青铜器、石头来书写的，也有用竹签、木条等来记事的。虽然它对当时社会情况和知识的记载十分简略和不够完善，而且内容多是记事性质的，其目的不是为了传播经验，交流知识和供人阅读，而是为了帮助记忆，避免遗忘，以作处理实际事物